

#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两首“春之歌”的故事

●王蕾 卢嘉妮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歌中的小燕子，衔着深情的春日信笺，掠过了几时的天空，从遥远的异乡返回故地，那黑白两色的灵巧身影，恰似玲珑的迎春花，给万物带来盎然春意。瓦蓝的天空下，柳枝如同春风梳开的条条辫子，轻拂起泛着涟漪的池塘。山岗上开满了朵朵桃红，松柏在浙浙沥沥的春雨中尽情舒展年轮。屋瓦青灰，炊烟袅袅，这些报春的使者轻啄起迎春的诗句，侧身飞过农人们劳作的背影，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正如小学语文课本中所写：“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了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

儿童歌曲《小燕子》是作曲家王云阶为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护士日记》创作的一首插曲，写于1957年。歌曲用童话般的语言，生动描绘出社会主义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面貌，把女主人公比作辛勤的小燕子，号召广大有志青年以此为榜样，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潮。歌曲随着影片不胫而走，婉转动听陪伴着不同年代的无数人走过金色童年。

据词作者王路的大女儿讲述，激发其父创作灵感的来源，正是童年时河南确山老家屋檐下筑巢的那群燕子。“父亲曾说过，酝酿《小燕子》的那阵子，他经常想到和我奶奶在确山老家生活时，春天屋檐下燕子筑巢的情景。燕子总让父亲想念老家、想念妈妈。”王路把对童年、家乡和母亲的炽热情感，编织成了一串串质朴流畅的歌词。1956年冬到1957年春，王云阶在包钢体验生活，“当时，包头市钢铁联合企业还刚刚在兴建，满地用粉线画着包钢的宏伟建设规划的图画，正在从美丽的理想的平面图向美丽的现实的立体建设转化的过程中。新鲜景象有力地吸引着我，使我像一个小孩子走进了美丽的童话世界！”（王云阶《小天使解放了（小燕子）》）

王云阶一眼看中了这首情真意切的小诗，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加以修改，觉得意犹未尽，又补写了一段歌词，并把“小燕子穿花衣”的“黑”字改作“花”字，根据在内蒙古学到的民歌音调谱了曲。歌曲为五声音调式，4/4拍，由一



春燕图

江寒汀

呵成的通谱歌形式写成，旋律多以小三度上行五声音阶式进行，吻合语言的声调，几次出现了附点音符，都巧妙地结合了语言的节奏、韵律，曲调平稳，结构规整，词曲结合紧密，以一颗童心讲述了新中国的儿童与小燕子朋友般地谈心，唱起来朗朗上口，娓娓动听。经过演员王丹凤的深情演绎，《小燕子》飞入万户千家，写进小学音乐课本。房树民、黄际昌在《向秀丽》一书中记述了向秀丽烈士牺牲前的一段感人场景：末了，她请求医务人员：“请你们唱一支歌吧。”“你喜欢听什么？”“再唱一遍《护士日记》的插曲。”歌声轻轻地在病房里回荡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这时，向秀丽唇边泛起了笑容，她也跟随着唱了起来：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1992年，《小燕子》获评第一届当代少年儿童喜爱歌曲

奖。如今，当这一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之时，我们依旧能从一个个绽放着桃红酒窝的欢欣音符中，目睹这群归乡的游子展翅拥抱惬意的一草一木，盘旋在柳梢、湖面、屋檐，为春天送上漫天礼花的动人情景；燕子们忽远忽近的鸣叫，像是在热切地宣告：燕子还来寻旧垒，又是一番新桃李。

“莺歌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燕子与春水带来的江南春意，也铺展在古诗词中。“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五言绝句《春晓》中，诗人通过听觉感受和联想捕捉典型的春天气息，生动描摹春日之景象，既有春宵梦酣的慵懒，又抒发了对春光流逝的怜惜之感。

除了燕子在追逐春天的倩影，孩子们也纷纷寻找起春的足迹。呢喃的燕语莺鸣是鸟儿们对春天降临的奔走相告，由“儿歌大王”潘振声谱写的歌曲《春天在哪里》，就巧妙地利用黄鹂的清脆啾啾表达春日的美好。歌词中的春天，在苏醒的枝头冒出新芽，一点点覆盖冬的萧瑟，唤醒整片树林；在映衬着山色的水面，化作细雨轻叩起层层涟漪，露出如花笑颜……三段歌词，将春天藏在青翠的山林里，映在湖水的倒影中，绽放在孩子的眼底的情形描绘得栩栩如生，充满童趣。潘振声先生在读完诗人望安的歌词后，情不自禁地来到湖边，和孩子们一起交流玩耍，很快产生了灵感，一晚上就完成了谱曲。这首《春天在哪里》，也成了孩子们心中无可替代的“春之颂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这是从古至今无数艺术家用美的视角不断诠释着的命题。或许春天正在某个飘着细雨的清晨，乘着歌声的翅膀，稳稳落在这片广袤丰腴的土地上，迎着暖阳在农家屋檐下生根发芽。儿童歌曲的创作者们从一片深绿中拾起一枚枚音符的种子，向孩子们和多年前曾是孩子的我们，翻种下风和日暖的寸寸光阴，让春天不仅在歌声中流淌成诗，更是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流逝的岁月里，氤氲在对未来的期许里，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慰藉与力量。不论何时，待我们再度唱响春天的时候，它定会衔起儿时的那缕阳光，穿过翠绿芬芳的大地，唤醒曾经冰莹的思念。

宛，令人不齿。自苏轼《荔枝叹》诗流传后世，贡茶以邀宠便成为“前丁后蔡”的历史污点。作者却通过对史实的深入考证，认为福建贡茶由来已久。自南唐开始，建茶便已成为贡茶，丁谓作为转运使，关注茶业并加强管理是其本职工作。蔡襄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研制出闻名天下的“小龙团”茶，并对茶场的管理和茶叶运输都进行了改进，既满足了公众对高品质茶叶的需求，也增加了财政收入。二人所为不仅不是邀宠，而且是突出的政绩。作者将被苏轼污名化的历史进行还原，纠正了以讹传讹的错误认知，对丁、蔡二人作出了客观评价。

实际上，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书信中潜藏信息的解读，这更可见出作者心思之细密及对史料辨析之深刻。比如张浚在给岳飞的信（《谈笑措置帖》）中，颇多奖慰之辞，语言极为客气，以张浚彼时川陕宣抚处置使的高位，完全不必卑尊降贵，给一个品阶低下且远在江西的武将写这样一封没有实质内容的信。作者通过对北宋末之交背景下的宋金关系、朝廷与武将关系、主战派与主和派关系的分析，认为“张浚低姿态向岳飞示好，就是在拉拢关系，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结合后来的形势发展，这一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再如作者对富弼《温柑帖》的分析同样细致入微，不仅揭示了富弼微妙的心里活动，而且连带出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团权力斗争的广阔背景，以小见大，别具只眼。书中这样的精彩洞见比比皆是，令人不由得赞叹作者的心细如发以及善于发现史料之间关系的敏锐眼光。

本书以宋人书信为主要线索，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及对相关史实的钩沉，为读者呈现出立体的宋代人文画卷，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乏学术性，可谓异彩纷呈。

## 一幅宋代人文画卷徐徐展开

●吴增辉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仇睿霞著

近年来，随着宋代主题的出版物及影视作品相继推出，宋朝的人文情韵开始引发民众的浓厚兴趣。宋词之外，文人画、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等逐渐成为民众耳熟能详的宋代艺术标签。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更以其潇洒风流令人心向往之。宋朝逐渐以丰富立体的形象进入民众的视野，宋代文化也越发展现出迷人的风采。

真正了解一个朝代需要走到历史的深处，知悉丰富的历史细节，进而洞窥时代人物的内心世界。因为，一个时代的一切外在形态根本上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内在精神。北京画

院研究员仇睿霞撰写的《千面宋人》就是要深入历史的细节，深入宋人的内心，去呈现千姿百态的个体生命，以此解读一个风雅的时代。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千面宋人》主要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因此，其对历史的描述极力避免宏大叙事，而重在梳理人物关系，发掘历史细节，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诸多细节又往往通过人物之间的书信牵扯出来，借以铺展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书中引用了范仲淹、苏轼、欧阳修、司马光、苏洵、黄庭坚、米芾等37人的90封书信，其中苏轼以20封书信高居榜首。这些书信同时也是风格各异的书法作品，为读者生动展现出千百年的文采风流，令人大开眼界。作者又不辞辛苦地把书信大意译给读者，让人更真切地体味宋人的用语规范、社交礼仪和情感内涵。说实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人书信用语跨越千年，与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隔阂，一些写信人为追求古雅，刻意使用晦涩的语词，更造成后人理解上的困难。比如叶清臣写给郑戡的一封信（《近追大旆帖》）便颇不易懂，其中“涓”“甯”等词语需要深入索解，作者为求确解下了不少功夫。书信内容涉及写信、收信双方才知道的事情原委，要想梳理清楚并作准确的说明，需要对各类信息加以细致的考证。作者从书信提供的有限信息出发，联系写信人的生平事

迹、写信背景、人际关系乃至时代风俗，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钩沉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比如由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一封信（《人来得书帖》）出发，作者提出“苏轼为何送一担酒作为丧礼”的问题。随后结合苏轼在黄州时的经济状况、宋人葬礼用酒量颇大的时代风俗以及宋代榷酒专卖制度等资料，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考察历史是作者的偏好，但凡书信中提到的历史信息都会被作者抓住不放，深挖细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比如作者通过比较蔡襄、欧阳修等人丧母之后写给友人的书信，发现信中的哀告语大同小异，实则遵循一定的语言模板。作者认为这类让告类书信属于宋代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新儒学兴盛的时代，尤其是北宋前中期，丧葬期间的许多行为都要遵守特定的礼仪，写信也是如此”。这一判断为读者认识宋人此类信件特点及相应的文化背景颇有启发意义。此外，书中对宋代澄心堂纸的来历、毛笔的演化、墨的制作、山药的种植、河豚的吃法以及相关人物的逸事，也进行了颇有意味的考辨，令人读来兴味盎然。

有的书信还会牵扯出有名的历史公案，比如苏轼在其晚年名作《荔枝叹》中批评丁谓和蔡襄“争新买宠各有出，今年斗品充官茶”，认为二人通过向朝廷进贡名品官茶媚上邀

景象，他却能以笔触直抵人心，成就千古绝唱，盖因其对山水“自然”特质的敏锐与易感，抓住了其“质朴”本质。他对自然山水天然善感，不论秋日薄暮入夜之际的微妙转换，还是“返景”“复照”青苔的刹那间的气象变化，皆通过捕捉自然转瞬即逝的时移物易，描绘乾坤的妙趣灵动与空明清远。

席勒在《论质朴》中指出：“要做到质朴，就得自然胜过人为。”王维的山水诗不事雕琢，遣词极为素朴，常用白描手法描摹自然山水。对于自然的“质朴”本质，席勒一针见血：我们之所以由衷生发出对自然万物“自然本性”的喜爱，根源就在于它们“是其所是”。自然山水不因时因地而易的“质朴”特性，才是触动人心的根本。王维山水诗的独到之处，恰恰就在对自然“是其所是”的充分尊重。诗人藏起“自我”，物我融为一体。

不过，王维遣词虽质朴无华，却并非对自然山水的简单白描，而往往留白充分，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落日斜晖，余味不绝，空谷留音，余音缭绕，令人回味无穷，仿若天籁就在山水的自然律动中。王维的山水诗也绝非对山居生活的简单记录，而恰是他对自然山水与山居生活的体察和拣选。王维山水诗中的空灵与质朴，映照出的正是他内心的闲适与超逸。

### 闲适中的超逸

刘勰云：“是以四序纷回，而兴贵闲。”（《文心雕龙·物色》）王维的“虚静”和闲适感，主要体现在对自我的虚化处理和对“无我之境”的营造。以《鸟鸣涧》为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全诗以“闲”立意，诗人没有

直白出现，而是化作超身物外的“我”。王维山水诗中的“虚静”不仅在于物我关系的调达，更透露出诗人的超逸品格。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时，强调超逸空寂，物我交融一体。《鸟鸣涧》正是以这种悬空自我、以物观物、以物衬物的“静观”手法，臻至“无我”之境。

王维喜以“闲适”入诗，其山水诗所透露的“闲适”与“超逸”气象，既反映了诗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也是他体认人情世事的投射。《鸟鸣涧》着眼于山间花鸟，夜静山空，却在“人闲”与“夜静”中暗藏道心与天机，言尽却意不尽，余味绵长。人闲固然足表诗人的闲适，夜静又岂非诗人之心静？而这种闲静的心境，在月出鸟受惊的连动中衬托得愈显超然。山间万物皆自然山水孕化的生灵，而它们（包括“人”）又不过浩渺乾坤中自然妙趣的缩影。

王维对于四季轮回的更替，浩瀚宇宙中的物换星移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洞察，贵在心怀“虚静”。这种“虚静”不仅涉及物我关系，更在于心灵的安放。王维山水诗多取悠然自得的闲适和超逸之意，又何尝不是其淡泊明志的自况？叶嘉莹就认为，王维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以言志，其妙处就在于通过反向化用《楚辞·招隐士》而出世之愿，闲适恬淡之心愈盛（叶嘉莹《说初唐诗人》）。

王维山水诗中的“超逸”还往往以山水的净空衬托心灵的高远。王维历经宦海沉浮，却终未如陶渊明一样抽身仕途，归田园居。但他的心灵却并不为世事拘困，而是通过纵情山水，寻得一条体悟万物、达通情理的心世与自处之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王维中晚年流连山水，借自然

在中国古代，边塞诗十分盛行，到了唐代尤甚。它着力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高适的《燕歌行》《蓟门行五首》，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等，都流传甚广。

“羌笛何须怨杨柳”就是王之涣名作《凉州词二首·其一》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简单明了，十分好懂：纵目望去，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白云中间。就在黄河上游的万仞高山之中，一座孤城玉门关耸立在那里，显得冷峻又孤寂。何必用羌笛吹起那哀怨的杨柳曲，去埋怨春天迟迟不来呢，玉门关一带春风是吹不到的啊。

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就是指幅员辽阔的大西北。这里虽有大大山，但戈壁荒漠也多，著名的黄土高原就在此。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两句，便勾勒出大西北苍茫、浩瀚的轮廓。他虽不属边塞诗人，但他的边塞之作下笔有神，让人一诵再诵。

玉门关，我是去过的，在上世纪80年代。“孤城”之说，一点也不假。玉门虽然已繁华了很多，但从整体的地理环境上看，还是显得孤立无援。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就在玉门市——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把这座巍峨的孤城与王进喜联系在一起，觉得这座边关也应该姓铁。诗人李季笔下的玉门，便是战士，是石油工人，是铁打的硬汉！“春风不度”，是悲观的写法，春风是不会忽略玉门关的。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担心，友人过了阳关，就进入另一片天地，在那里，连折柳送友都很难办到。阳关，离玉门关不远，大概三十里的样子。在古人看来，这里也是春风不度之地，然而，阳关在历史上是繁华过的，曾经车水马龙，著名的阳关大道至今留有往日咿呀的车辙。作家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里有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后来成为百姓口头俗语，可见“阳关大道”之盛名。后来，沙进人退，草木枯竭，阳关变成了一片废墟，令人扼腕。我们去阳关走访的那一天，老天赏脸，风和日丽，长空中有几片白云在飘。一只金色的苍鹰在孤独地盘旋。而那耸立着的阳关烽燧，一身褴褛，仍站在沙海里，守护着这座关隘，令人动容。

在阳关遗址，有一些小店铺，只是不见有羌笛出售。羌笛，是羌民族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音域低沉而有些哀怨，很适合在大西北的滚石流沙中吹奏，如号角，闻之让人顿生斗志。就像马头琴，最适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弹奏一样。它们都奏出了古老民族的心声，呼天抢地般，在祈求上苍保佑这一片生存之地。那里是覆盖着白雪的祁连诸峰和乌鞘岭，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山岭之下正安详地吃草的白牦牛和黑牦牛。我总觉得，它们不是一群被人驯服过的牲畜，而是西域这片土地的主宰者，它们走下祁连山，凝望着这个世界的沧桑变迁。

斗转星移，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正如我国的许多沙漠地带一样，如今，这片土地上，沙在退，人在进。一片片戈壁荒漠，正在变成生命的绿洲。这便是我们这个古老族群的韧性智慧。假如有生命轮回，假如王维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踏上这条长长的河西走廊，“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忧定会消解。王之涣也不必再感叹“羌笛何须怨杨柳”了，春风早就度过了玉门关和阳关。连往日显得孤寂、哀怨的沙漠驼铃声，都变得清新、愉悦，充满了春的气息。

我是喜欢甘肃这片土地的，前后去过五六次，喜欢它的苍凉、辽阔，以及质朴。它的地底，埋有往日的辉煌历史，往日的繁华，往日的人文与哲思。

在甘肃友人的陪伴下，我走过整个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中间，长约1000公里，宽几公里至近200公里。我轻轻叩过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城市那厚重的历史之门。那里的人，格外质朴、豪爽、勤勉。那里的酒，格外香甜、绵柔，一饮即醉，但不上头。河西走廊是片富饶之地，它的人文历史是无价的宝藏。在武威，友人送我一件当地出土的青铜奔马的仿制品，即著名的文物“马踏飞燕”。在行车途中，窗外是覆盖着白雪的祁连诸峰和乌鞘岭，我目不转睛地凝视山岭之下正安详地吃草的白牦牛和黑牦牛。我总觉得，它们不是一群被驯服过的牲畜，而是西域这片土地的主宰者，它们走下祁连山，凝望着这个世界的沧桑变迁。

斗转星移，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正如我国的许多沙漠地带一样，如今，这片土地上，沙在退，人在进。一片片戈壁荒漠，正在变成生命的绿洲。这便是我们这个古老族群的韧性智慧。假如有生命轮回，假如王维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踏上这条长长的河西走廊，“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忧定会消解。王之涣也不必再感叹“羌笛何须怨杨柳”了，春风早就度过了玉门关和阳关。连往日显得孤寂、哀怨的沙漠驼铃声，都变得清新、愉悦，充满了春的气息。

感兴表露遇而安、一片澄明的闲适超逸之态。自然山水的空灵与高远，反映的是诗人超然外物的人生态度。山水空幽，天地广袤，对应的是襟怀的宽广，充分表明了自然景观对人的感情的调平和情志的调达。

### 山水诗的情致与情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面对四时更替，万物迭代，人的情感受外物感召自然兴发。山水诗对自然万象情态的描绘，自成情致。王维善于营造渺远的清致，将人的自然情感化归自然山水的质朴灵动。

由自然山水触发而生的清致不只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渭城朝雨”的清静澄明，黄河落日下的雄浑辽阔，抑或空山新雨后的风清月朗，皆为诗人情志的表象。王维山水诗精微又不乏恢宏。《汉江临眺》渲染了山水的宏阔气象，给人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种时空恒久、山高水阔反映的是诗人疏阔的情志。

王维早年积极入世，受张九龄擢授，官居右拾遗，有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王维的山水诗也多取积极的盎然勃发之态：“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王维以此勉励友人效仿蜀地先贤“文翁”，建功立业、积极进取。但因受仕途接连打击之后，王维对仕途进退，祸福际遇有了更深理解。晚年的王维似有反思：“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已长。”（《赠卢侍御虚舟》）。在人生进退失据之时，王维选择寄情山水调平情志，退守“内我”，获得了自处之道。

晚年的王维借以自然山水兴发归隐之志。其含蓄敦厚的清致，接续的是诗经，而非楚辞中幽愤的情怀。连王维的“不遇诗”也别有筋骨，从而极大调达了怨怒之气。这种正雅冲淡了山水诗中的“不忿感”与“不遇感”。王维山水诗中失意感的表达，更多是借自然冲淡或消解失意情绪。这种情感上的节制令王维山水诗写景空灵却不虚空，表“不遇”却不愤懑，透着他世事洞明和情理通达的平衡感。这种对万物质朴而敦厚的“君子之心”，使之既能与“天地同情”（王夫之《广雅》），也能使自己在变幻无常的世事纠葛中立身处世。